

党史浪花集

吴健民 著



党史浪花集

吴健民

坚持正义与斗争

吴健民

1958.3.18.

〔闽〕新登字 09 号

党史浪花集

吴健民 著

*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华安县升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6 印张 136 千字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500 册

ISBN 7-5615-1291-0/k · 222

定价:10.00 元

自序

我总觉得，党的历史同党员的政治生活是连结在一起的。有时，自己还会感到这种连结非常非常的紧密。我入党之后，从自己的政治生活中，体会到有了党的方针政策的指导，又得到党的教育，才逐步懂得了党的原则，开始培育着自己的党性。

但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生活，对于党史，毕竟是沧海中的一滴。虽然我知道我的党龄中，分明能够找到党史的某些方面的极微小的影子。但是，真正使我对党史有了初步的观念，还是在胜利地结束了解放战争，进入城市之后。

胜利了。在执政的政治生活中，开始了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土改整队中，开始审查自己的历史。我这个时候，已有十多年党龄。你不能不去回忆涉及地方党史的许多人和事；你不得不去作出在以往的地下党的活动中自己思想倾向的探讨：“左”了？右了？这是不辨是非懵懵懂懂跟着走？那个时候，对自己的历史的总结，似乎不允许有“正确地走过来”这种解释。

以后，政治运动的发展，有许许多多干部在受审查中要我给作出证明。我知道这是我的历史责任，也是一种政治义务。我的证明当然要立足于历史事实。于是在写各方面的证明的多次回忆思索中，我开始认识到必须根据党性立场，对地方党组织的历史，进行各个方面的总结，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对党的历史有一个系统的记载，从认识历史的某一片断，到认识

历史的全面。从认识个性，到认识共性。“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在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和僵死的东西。”^①

这就是对党史进行总结的基本方法。

这个时候，我开始有一个希望能产生一部看法统一的党史的期求。

1952年，广东掀起了席卷全省的反“地方主义”运动。对于南方党组织的看法，众说纷纭。以后，同所谓地方干部“严重不纯”连接在一起的对潮汕党组织的怀疑和攻击，也铺天盖地地汹涌而来。这些诬蔑性的语言，像一把把利剑，刺向我的灵魂。我感到义愤，也感到痛心。我真不明白，一个中国马列主义政党，属于自己肌体的一部分的南方党组织，为什么要遭此扭曲历史的诽谤？但是，又有谁能在这个时候，拿出一部正确记载闽粤赣边区党史或潮汕地区党史的真事实录的史书呢？！

一个国家，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文明古国；一个政党，特别是像我们马列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总结总是最有力的教育武器。邓小平同志说：“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青年人不了解这些历史，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②我

①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09—31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

②邓小平：《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常想,我们经过许多曲折,终于选择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采取了开放的各种政策。要真正理解这些,仍然要靠回顾和总结中国革命斗争史,回顾和总结党史。这是最深刻的一种教育手段。“总之,我们在本世纪还要用十几年时间,下世纪还要用三五十年时间,继续向人们证明,我们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①

所以,自己在工作实践中,在整个的政治生活中,确信我的历史责任之一是,要关心党的历史的总结,支持地方党史工作。并且,以此观点鞭策自己。

潮汕地方党组织系统地进行党史发掘、征集、研究、编写工作,我记得是到了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才集中力量抓起来的。闽粤赣边区党史的编写工作,还要稍迟一点。那个时候,我刚到珠海去筹划建市以至试办经济特区,当“开荒牛”,确实忙得不可开交。地方党史部门的同志体谅我的这种喘不过气的工作状况,联系不多。

到了1984年,我退回广东省委顾问委员会后,对党史工作的接触就多了。我也写了不少资料、信件和文章。我深信党史工作确实要依靠许多老同志的。老同志都是战争年代的幸存者,有丰富的经历和斗争实践经验;老同志比较自觉地愿意尽提供、查证史料的历史责任;老同志政治上比较成熟,对于写党史,能够提出较明确的观点。但是,老同志毕竟是年纪大了,也有自身的弱点:记忆力衰退了,几十年前的事,容易印象模糊或记错情节。容易犯固执,也是老人的通病。何况,老同志之间,由于解放前的工作地区或工作岗位不同,看问题的角

^①邓小平:《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度也不同,当年的认识水平尤其不同;同一个史实,对于本人的关系,也有深与浅、直接或间接、利与害的关系等的差别。所以,在讨论党史史稿的时候,往往出现思想的碰撞,认识观点上的争论,有时还显得相当激烈。

记得毛泽东同志说过:“人的概念的每一差异,都应把它看作是客观矛盾的反映。客观矛盾反映入主观的思想,组成了概念的矛盾运动,推动了思想的发展,不断地解决了人们的思想问题。”^①而事实上,在人们通过党史问题争论解决思想问题的时候,却曾经发生许许多多的意识境界问题和重要观点分歧问题。有时引起的风波还对人们冲击不轻。

有的同志在写回忆录的时候,一味突出自己,造成不良的影响。有的同志对历史上自己的职务与作用,希望趁编写党史的机会能有所“拔高”。有的同志带着私心杂念造成史实的混乱,引起无端的争论……。这一切,确实增加了党史工作的困难。同时,又人为地产生党的历史的是非问题。不仅是这样,我们还要不回避矛盾、实事求是地说,个别同志确实存在对待党的历史的态度问题。

对于写史涉及责任问题,我一贯主张要慎重处之,“宜粗不宜细”。可是,也许有人却认为历史上的某些问题,会涉及我自身的责任,是我为了推开责任而拿“宜粗不宜细”来作借口。如果真的有人这样想,这样说,我当然要严肃对待,予以澄清。1947年7月,在澄海发生的四位姓陈的负责同志被捕的“四陈事件”,忽然间提出了我的“应负主要责任”问题,就是这样莫名其妙地花费了我的不少时间,干扰我正常的工作。这件

^①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0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

事，越搞越复杂，分清是非的时间越拖越长，传播的影响越来越糟糕。回想起来，有时也感到无端挨一棍子的愤懑和受到内部伤害的沉痛。

对待党史的态度这一问题，我在一封有关党史问题的信中曾说：“我们应该提倡，对待历史事实，知之则说知，不知则说不知，不可强不知为知。对于老同志，也是这样。这是我们的一贯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谁知连这样大家公认的原则，也有人提出非议。

对于党史问题发生的一些争论，应该采取什么解决的办法呢？我认为，最好是开诚布公地坐下来探讨、论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现在我碰到的情况是，尽管我诚恳地说理，耐心地等待，有关的同志总未能坚持走这条路。……那么，我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就只好寻求另一路子：把自己对一些地方党史问题的看法写出来公开发表，接受党史学界及社会的监督和裁判。这样，也有利于在社会引起更多的有识之士关心党的历史的某些问题，从而有利于加深对一些历史问题的认识。也因此从社会探讨中能得到是非、曲直的公正结论。

当然，这个集子所收入的文章，并不是都属争论的产物。我只说是其中的一部分，确实有加以探讨、说理、分析的价值，因而它有必要得到社会上对是非的客观评价。

去年11年，在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和中共党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议上，胡锦涛同志讲话中说：“发展新的事业、开创新的局面，更需要总结、研究历史经验，做好以史鉴今，以史育人的工作。”还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各项工作之所以进展得比较顺利，我们的经济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在世界形势发生重大而复杂的变动时之所以能够经受住严峻的挑战，在一定程度上是与我们党认

真总结历史经验、正确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分不开的。”他还号召我们大家应学习、理解邓小平同志的历史观、方法论以及他对党的历史问题、历史经验的大量精辟论述，包括关于研究党史要坚持党性，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的论述。

从党史的全面工作来说，广东省是搞得比较出色的。潮汕地区党史工作也做得不错。也许是这个缘故，党史研究中所暴露的一些思想矛盾也引人注目些。

因为我参与的党史研究和撰写，曾包含着不少思想的碰撞和认识上的交锋，溅出的浪花是常见的。所以，我将这个集子定名为《党史浪花集》。

我心里明白，这里所论及的都是粗浅的和局部地区的党史问题。有些还有待进一步探讨。谨以这些议论，就教于众多历史学家、党史工作者和诸位尊敬的读者。

吴建民

1995年6月26日

于广州农林书屋

目 录

自序.....	(1)
潮汕抗日战争的回顾.....	(1)
我们实行过战略退却	(14)
历史必有公正结论	(30)
附:1994年7月14日《南方日报》一则消息	(37)
写党史应注意有别于军史	(39)
对广东解放战争历史一些问题的看法	(44)
潮汕党史第二稿的几点意见	(55)
“你们应该写林美南!”.....	(59)
关于《中共潮安简史》一些问题的探讨	(65)
潮汕党史第三稿的意见	(69)
关于《狱炼》的一封复信	(80)
关于《中共澄海简史》的一封信	(85)
从责任问题看党性	(93)
附录一:陈×同志的《联想》	(123)
附录二:陈汉的《我谈“四陈事件”》	(135)
关于《魏金水传》的几点修改意见.....	(151)
党史书简十一封	
致杨玉坤关于《赵崇护》的信(1987.6.8).....	(157)
致潮州市党史办信(1987.9.8).....	(159)
致澄海县党史办信(1987.9.8).....	(161)
致蔡超信(1988.4.23)	(163)

致陈英和并杨玉坤的信(1988. 9. 2).....	(164)
致余延年信(1988. 11. 20).....	(165)
致习楷、明瑞等同志信(1989. 2. 5)	(168)
致刘俊浩及潮洲党史办的信(1989. 8. 12)	(170)
致秦梓高并汕头市党史办信(1990. 10. 8)	(172)
致秦梓高关于华声书店问题信(1992. 3. 26)	(174)
致林天乙的信(1993. 6. 15)	(176)
跋.....	(178)
后记.....	(181)

潮汕抗日战争的回顾

转瞬间，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日到来了。今年的许多国家都在隆重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在这个纪念世界反法西斯胜利的日子里，广东的潮汕人民，回顾一下抗日战争时期那血泪的悲惨日子，回顾一下潮汕人民同全国人民一起，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光辉业绩；回顾一下中国共产党潮汕地方组织领导抗日斗争走过的八年历程；回顾一下潮汕的人民英雄们在抗日战争时期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是很有意义的。

遭受蹂躏的日子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8月9日，日机开始轰炸汕头、潮安、揭阳、饶平等地。自1937年9月至1939年5月，仅潮安一地，即遭日机200架次的轰炸、袭击，死伤数百人。12月13日，日军开始在南京进行血腥大屠杀。继1938年5月，日军攻占厦门，7月再度侵占南澳，10月占据广州之后，日本侵略军终于在1939年6月21日，入侵汕头。进而占领潮安和澄海。

从此，潮汕沦陷区人民，遭受蹂躏屠杀，过着饥饿受辱的悲惨日子。单说日军进攻汕头，先占庵埠，那天是端午节，赶市的人很多，逃避不及，被杀死的就有100多人。官路村两青年

被日本兽兵活活刺死，并以鲜血喷在军旗上。从汕头逃出的内陆船只，在当天下午来到庵埠，不料庵埠已被日军占领，几十艘民船及小电轮上全部的船民旅客共 300 多人，均被捆绑囚禁，至深夜，拖到江边，日军用军刀、刺刀乱砍乱刺，毫无人性地屠杀这批无辜百姓。日军所到之处，奸淫掳掠，极尽残忍之能事。有将抓到的人作训练刺刀术的靶子杀死的；有将所俘农民埋半身 in 土中，上身用刀割破，浇煤油活活烧死的；有报复性的烧杀，将人先砍头然后全身劈成四块丢入火中的；有将妇女脱光衣服，调戏猥亵之后，用开水活活烫死的……

1940 年 3 月，日军攻入潮安枫溪镇，实行大屠杀，碰到鬼子的男女老幼，无一生还；先后被杀达 734 人。日军进攻浮洋一役，使用毒气弹，中毒群众达二万多人。1941 年 6 月，日军在枫溪以西辟“无人区”，将封锁沟铁丝网以外一千几百米的地段夷为平地，原有深洋村 307 间房屋尽数烧毁，村民 600 多人流落在外，饿死和失踪 300 多人；孙厝村一千多间房屋全部被毁，130 多人被杀，余均流落他地。

日军攻占澄海城，见人就杀，有名可考者即达 700 余人。1939 年 10 月，日机二架深入饶平浮山轰炸、扫射，时值圩日，群众不备，被炸死 300 多人，血肉横飞，惨不忍睹。1941 年 3 月，日军攻占潮阳城，烧杀掳掠，一片血腥。1943 年 10 月，日军带伪军进攻揭阳大脊岭，洗劫官硕村，毁民房 2200 余间，乡民被打死打伤达 700 多人……

大饥荒，死、逃逾百万人

就在外敌入侵的苦难岁月里，1943 年，潮汕地区又发生大旱灾，赤地千里。国民党统治区，官僚与地主盘剥，军匪一

家，打家劫舍，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沦陷区更加上日本洋行、汉奸恶霸、奸商的垄断压榨，粮价飞涨，爆发起一场罕见的大饥荒。加上霍乱流行，死人遍地。人们到处寻找香蕉头、青金叶、苦菜心、薊苋、郭勾头充饥，采光了，就挖蚯蚓、抓癞蛤蟆，甚至捡日军军马的马粪，淘洗点残渣来填肚皮。据统计，潮安县在沦陷期间，饿死6万多人，逃荒10多万人。饶平饿死8.1万多人，逃荒2.7万多人。潮阳饿死和患霍乱致死达15万人，逃荒7万多人。揭阳全县饿死6.8万多人（未计入霍乱死者），逃荒2.4万多人。普宁全县饿死者近10万人，逃荒数万人。惠来的情形更为悲惨，全县死于饥饿和霍乱的共达15万余人（其中六成人是饿死的）；在这血泪的日子里，竟出现了卖人肉的惨况。

抗战八年，潮汕人民在抵抗侵略者的民族战争中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家园破碎，人民流离失所，许多人惨遭凌辱屠杀。仅潮安的统计，全县被日军打死、杀死、炸死的共8800多人，致残终生的800多人，饿死6万多人，逃亡失踪的3万多人，被强奸的妇女3000多人，绝户者达7000多户；被烧毁房屋3万余间，损失耕牛、农具以及其他物资难计其数。

这是一次世界性的由法西斯国家发起的战争灾难，卷入这场灾难的达20亿人口以上。

我们当然注意到苏联人民在抗击德国法西斯百分之八十的武装力量的残酷战争中，付出了2800万人的生命代价。而我国所直接抗击着日军百分之九十的力量，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仍打击和牵制日本陆军三分之二以上兵力的中日战场，坚持了八年之久，作出了军民伤亡达3500万人的重大牺牲。

经受考验的四个阶段

但是，中华民族是不可征服的。在坚持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同中国国民党领导的抗日军队，打击日本侵略者，使日本损兵百万，也使英美在太平洋战场赢得了时机；最后，终将日本侵略军驱赶出中国领土。

潮汕地区是经过多次战火洗礼的地区，潮汕人民是富有革命传统的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潮汕人民同样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潮汕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实际上经历了四个阶段：这就是芦沟桥事变前后至1939年“六二一”的武装抗日准备阶段；1939年6月日本侵略者入侵，潮汕军民奋起抵抗，中共潮汕组织高举“潮汕青年抗日游击大队”的公开武装旗帜，战斗至1940年4月，这是利用公开合法形式进行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前期作战阶段；还有自1940年4月起至1944年9月，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化整为零，转入敌后，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阶段；和1944年9月起至日本投降这个抗日武装斗争重新进入公开发动的阶段。

青年运动同农民运动的结合

潮汕抗日武装斗争是在普遍开展抗日文化运动，加上“一二·九”抗日救国运动影响下，青年救亡运动结合广大农村兴起的抗日救亡农民运动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是潮汕抗日武装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

早在1934年，虽然当时潮汕地方红军处在艰难曲折的分

散坚持阶段，城市工作的组织联系也极困难。但是，潮汕地区有一批党的工作者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并派人到汕头发起抗日民主文化活动。所以，潮汕地区较早地建立了同上海左翼文化团体的联系，并在汕头逐步发展了一批由进步青年和学生组织起来的读书会，传播大批革命书刊文化，如《少年漂泊者》、《在鸭绿江上》、《八月的乡村》、《子夜》、《西行漫记》、《今日的苏联》、《大众哲学》以及《生活周刊》、《读书生活》、《世界知识》等等，团结教育着拥护抗日、倾向进步的大批爱国青年。

北平发起的“一二·九”抗日救国运动，消息传来，揭阳、潮安首先响应，举行了集会游行。接着中山大学宣传队抵汕，联合汕头进步力量和爱国学生，在1936年元旦后，组织了包括汕头市立一中、聿怀、大中、海滨、回澜、省商、同济、宕光等中学几千名学生的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冲过军警的包围圈，到中山公园集会，“誓以血和肉来粉碎侵略者的枷锁”，揭开抗日救国的潮汕青年学生运动的序幕。以后，进一步在工农群众中办夜校，办识字班，发动拉丁文新文字运动，利用《星华日报》占领报纸阵地，团结一批进步青年到各地办学等，使抗日民主文化运动继续深入发展。

到了1936年冬，潮汕开始建立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华南抗日义勇军”，进而成立“岭东小学教师救国会”；办起《先声晚报》副刊《海岸线》。“七·七”抗战爆发，组织“汕头青年救亡同志会”，潮汕的青年抗日救亡运动即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随着全国抗战形势的发展，青年救亡同志会的组织迅速向潮汕各县扩散，各地都纷纷成立这种组织（后改为青年抗敌同志会）。还多样化地建立各阶层妇女投身抗战的“妇女抗敌同志会”，由归侨组成的“归国华侨抗敌同志会”和侨抗会工作队、宣传队、救护队；以至在工人、店员、学生、教师中组织各种

抗日救亡团体。

潮汕地区通过青年抗日救亡运动，团结了大量的知识分子，又通过这些知识分子进入各地的学校阵地。潮汕地区至1941年12月止，党所掌握的农村小学达400所，中学约30所。就由这植根于农村的学校阵地，将党的种子播种到农村去。城市抗日救亡团体，也派出宣传队到农村宣传，派演出队到农村演出，并通过识字班、夜校、闲间、拳馆、英歌班等等形式，宣传联系群众，将工作做到姊妹会、兄弟会、守青队、父母会等等民间组织中去。有不少地方还发起农村的互助和生产合作；动员数千学生、青年协助农民修筑河堤、坡圳，开荒扩种，帮助抗属和农村困难户耕种、拾肥、借贷种子等，建立起与农民的密切联系，逐步形成广大农村的群众运动。

在此青年运动与农民运动结合的基础上，党在农村广泛组织秘密的抗日游击小组，抗日后期，还有强大的地下民兵队伍，直接配合抗日武装行动。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运用

潮汕的抗日斗争又一个特点是，依照中共中央所指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原则组织这场斗争。

日军入侵潮汕之前，中共潮汕组织，已经注意到国民党驻军的工作。1937年夏，李平^①在香港向中共南方临工委汇报工作的时候，即得到临工委介绍同“全国各界救国会华南区总

^①李平，潮汕党组织领导人之一。1936年2月参加共青团，同年九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潮梅特委书记、潮汕地委副书记、轻工业部副部长等职。1994年5月在北京病逝。